



建設中國精神文明

田英傑著

陳愛潔譯

近日人們經常聽到對中國社會刻薄而措詞生動的批評，諸如「社會混亂」、「思想紊亂」、「道德敗壞」等，甚或說這是「一個活在道德真空而沒有靈魂的社會」。即使中國的高層官員和大眾傳媒權威，也毫不猶豫地公開承認，大陸存在著生活的黑暗面。最近，一位著名社會學家作出以下的評論認為，這一代最常見的毛病，就是精神空虛和失去心理健康；這是人性最崇高抱負的敵人。（註一）他的話並沒有令人感到驚訝。

去年九月，國家主席江澤民向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講話時，親自強調有需要採取嚴厲的措施，糾正一個顯然墮落的局面：「落實一九九五年計劃體系以及採納二零二零年長遠目標，將有助於把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需要，提升到更優先處理的層面。」（註二）

我們即使身在遠處，也可看到中國當前「道德危機」所展現的多面而

複雜的圖象。然而，以下兩項要點正有助澄清其中所涉及的問題，他們分別是道德危機對中國共產黨以及對群眾（即平民百姓）所帶來的影響。

當前的道德危機

黨員面臨的所有道德罪惡可綜合為兩句話：「官僚腐敗」，或其委婉的說法——「不正之風」。政府和大眾傳媒已公開譴責幹部涉及的一連串貪污行為，包括：行賄、受賄、盜用公款（註三）、逃稅以及敲詐；官商不分、利用公營機構來謀取私人利益，導致失去個人在工作中的自尊、崇拜金錢、官僚作風（註四）、裙帶關係與徇私、爲了個人利益而勾結犯罪份子、偽造及誤報官方報告、揮霍和放蕩的生活方式、金錢至上。最近，香港英文報章《東方快訊》引述《人民日報》社論說，如果人們習慣了不說真話，或吹牛，或欺騙上司，告訴他一切進行得順利，卻隱瞞所有不妥當而揮霍公費，則仍可算作一名遵守黨規的共產黨員嗎？（註五）

對群眾來說，「道德危機」的含意較廣，並有不同的現象。首先，現時人們傾向崇拜金錢。隨著鄧小平提出衆所周知的告誡——「致富是光榮的」，

賺錢與花錢似乎是所有人的一致價值觀。很多人公開承認，他們視金錢爲「人生的最高價值」，而且「是萬能的，是崇拜的對象，也是幸福的泉源。」不少人「被金錢誘惑，失去所有辨別是非的能力。」以一般人的用語來說，現時改革運動的特色，就是「每人都要賺錢，而所有人已準備下海經商。」

· 追求財富導致很多寡廉鮮恥的人採取非法途徑致富，包括暴力罪行、販毒、賣淫或賭博。

· 人民當中的「道德危機」的第二個現象，就是極端個人主義思想已經來臨。人對父母、師長與老人家失去應有的尊重，對家庭欠缺適當的關愛，而那尊重公物與公共設施的社團精神也遭削弱。

· 人民「道德危機」的另一項清晰現象，就是失去思想和道德價值體系。然而，令「道德危機」惡化的，是一般所指的「六害」：賣淫嫖娼、淫穢

物品、拐賣婦女兒童、賭博（註六）、毒品問題以及封建迷信；而這「六害」正顯得日益猖獗。一九八九年，國務院發表的報告指出：「賣淫嫖娼……與淫穢物品……從較發達的沿海地區蔓延到國內其他地方，這是最令人震驚的現象。」

該報告也提及，在同期的十個月內，有二十六萬人因賭博而被捕，而全國各地，尤其在貧窮的省份，拐賣婦女兒童的情況亦十分嚴重。較新的數字指出，全國有超過二十六萬名吸毒者和三十萬名娼妓，而其中只有少於百份之一正接受改造。

建設精神文明是艱辛的奮鬥（註七）

一九七六年，毛澤東逝世，實際上結束了文化大革命。「十年浩劫」的特點，就是不停打擊中國的所有傳統價值觀念。文革初期，隨著毛澤東呼籲全國重拾革命初期的簡樸無我的爪肮）閩）確產生了某程度上的道德熱誠。但是，文革很快就淪為高層之間嚴峻而無情的權力鬥爭，而在農村裡，

則變成無理智的混亂。充滿理想的年輕紅衛兵變得冷酷無情，像罪犯那樣行動，凡他們所到之處，人和財物均被蹂躪。家庭遭受打擊並且分裂；子女告發父母，父母之間又互相告發。人再沒可能信任另一人。即使今日，他們仍被視為「迷失的一代」。

正統教育與社會文明被指為頹廢的資產階級行為；在社會的每個機構和工作單位都顯得非常紊亂。面對著仍普遍混亂的局勢，當局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舉行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上，成立了一個委員會，負責治療過去罪行所造成的創傷，並恢復社會秩序。

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葉劍英，被譽為是首位鼓著勇氣面對公眾的領導人。他承認剛過去的歲月所留下可怕的后遺症，並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治療方法。一方面，他承認須建立穩固的經濟及物質基礎；另一方面，他呼籲提高全國的教育、科學、文化及健康水平，培養崇高的革命理想與道德，並發展一個豐富而多元的文化生活。

一九八零年，鄧小平重申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

明的目標：一個進步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目標，應堅持共產主義理想、道德和紀律，並且透過不斷批評和改善法律與規條，拒受封建、資產階級以及唯利是圖的資本主義等影響。（註八）

一九八一年初，政府率先推行運動，培養人民的社會主義文明，並把三月訂為「社會主義道德月」。這運動的目的，可歸納在「五講四美」這口號：教育人民培養健康的思想和倫理道德；栽培人民對祖國和對群體的愛；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；實踐互助與合作的精神，勤奮工作和讀書，在服務人民時要表現得誠實和出色。（註九）

同時，隨著經濟改革以及中國進一步對外開放，人們趁機舞弊的事例亦有所增加，情況尤以幹部和共產黨黨員為甚。保守派利用這現象來挑起反對，把所有罪惡歸咎於改革和西方資本主義的影響。最後，雙方達成妥協，而一項整頓「不正之風」的運動於一九八一年八月展開。一九八二年四月，鄧小平在一個有關處理經濟罪案的討論會上宣佈，建設

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本身已是一項主要保證：中國將保持忠於社會主義路線。一九八二年九月，胡耀邦出任第十一屆共黨中央委員會書記時，亦闡釋上述講話。他說：「物質與精神文明，兩者是互相依存的……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整個黨的任務，也是所有階層人民的共同任務。黨內的思想教育是改善整個社會的文化與思想的支柱，而黨員應首先在思想和道德兩方面，擔當模範的角色……有需要組織一個強大的積極思想工作隊伍，好能說服他人並吸引他人。」（註十）

一九八三年下半年，當局通過一連串強硬措施，顯示他們已缺乏耐性，而求諸嚴懲，作為在對抗罪惡的鬥爭中唯一的獲勝方法。八月，當局展開運動，嚴懲罪犯，並在主要城市進行公開集體處決。（註十一）十月，當局進一步致力改革共產黨，集中在黨的整風及團結運動上。（註十二）十月底，在擴闊意識型態的氣氛下，當局著手推行「反精神污染運動」。如果國務院不加以干預，並藉著劃清界線

而恢復秩序，此運動幾乎失控成爲反對自由知識份子的鬥爭。雖然政府採取各項措施，但一般的情況只顯得更壞，因爲有愈來愈多機會，讓各級幹部貪污。如果這趨勢持續的話，後果將不堪設想。一九八四年，高層政府經已開始談及，鑑於黨內的貪污腐化，他們須迫切面對那正以駭人的速度、在群眾中蔓延的「信心危機」。一九八四年十一月，全國共產黨大會通過一項兩面措施：一方面，當局重新肯定經濟自由化及門戶開放；另一方面，主張採取更強硬手段，控制經濟舞弊及資產階級思想侵蝕。

一九八六年初，中國共產黨集中注意其黨員的「作風問題」。一個新的特別委員會打擊浪費，挑出幾宗明顯犯錯的個案並加以嚴懲。第十二屆六中全會召開時，完全通過建議的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」。（註十三）這《決議》顯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概念對黨內思想造成了重要的影響。

《決議》強調以下幾項要點：應以馬克斯原則

爲主導；應建立在物質進步的基礎上；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需要；培養持守社會主義理想、倫理道德、文化與紀律的愛國公民；提高思想與道德質素以及全國的科學與文化水平。亦必須爲了共同的目的而把全體少數民族團結在一個共同理想下，建設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，好能把國家轉變成一個高度文明和民主的現代社會主義國家」。《決議》還批評類似裙帶關係和官僚作風的弊端。此外，《決議》亦同意，改革應是循序漸進而遍及全國的，也必須堅持純正思想和共產黨領導。（註十四）

然而，情況並沒有改善。官方的報導指出，整風及團結運動於一九八七年五月結束以後，貪污腐化及其他社會毒害仍持續猖獗。

與此同時，一九八五及八六年的學生示威使保守派得利；保守派利用這些示威來展開全面的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」及「反西化」運動。胡耀邦遂成了代罪羔羊，被迫於一九八七年一月辭職。其後，當局與改革的少數派達成了協議。經濟發展將恢復

成爲國家的首要目標，開放及改革政策可以繼續，但必須堅持「四項基本原則」。一九八七年十三屆大會落實另一項思想妥協，就是接納鄧小平所提出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」的方案，指明中國仍處於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」。（註十五）

隨後的兩年，通脹、貪污、官僚的情況加劇，但當局又拒絕採納民主改革。中國共產黨所關注的問題，再不被視爲與城市民衆的生活息息相關，而在農村也持續失去歡迎。愈來愈少人願意入黨或加入共青團；然而，愈來愈多青年參加宗教團體。在農村，共黨幹部的說話現只有少許吸引力，但人們對宗教領袖的回應則是極爲積極的。（註十六）

最後，這一切的社會問題導致發生一九八九年的有組織學生示威。示威由胡耀邦的逝世觸發，迅速獲得社會各階層支持。示威使高層當局感到恐慌，因此，在六月四日那天，他們訴諸武力，派遣坦克車鎮壓示威，把學生逐出天安門廣場。

隨著鎮壓而來的，是那令人聯想到文革的清算

行動。其目的並非剷除黨內的貪官，而是那些「反革命罪犯」，即那些被視爲支持民主運動的官員。「敵對的外國勢力」也被政府指爲導致「反革命動亂」的部份原因。此舉引來西方對中國的尖銳批評，指責中國政府侵犯人權。

政府展開「反六害運動」時，承認問題嚴重，並公開展示燒毀淫穢物品，清除娼妓集結的街道，嚴懲毒販、拐賣婦女兒童者，肅清賭博及封建迷信。甚至毛澤東時代的大英雄——雷鋒，也在一九九零年三月「復活」起來，作爲克己與自我犧牲的模範。過去，「向雷鋒學習」是作爲一種途徑，應付當前廣泛散播的罪惡。

爲組織民衆建設精神文明，中國共產黨展開了一次引導性運動，其目標是使一億人成爲忠心的馬克思主義者。這極具野心的教育運動，是向國民灌輸思想，對抗「資產階級自由化」的散播。

運動的焦點是恢復及更新八十萬個共產黨基層組織，即農村共黨組織的中心。各大宗教代表也應

邀參與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在北京舉行的全國宗教工作會議。

黨雖然作出種種主動，仍未能贏得人民的信心。一九九一年六月發表中央委員會傳閱文件承認，黨仍受著雙重打擊，外有外國顛覆勢力；內有反黨勢力。當局抱怨由於黨忽略本身的紀律和教育，資產階級自由幹部得以滲透較高層的地位。當局亦表示恐怕「外國陰謀」要堅持破壞「中國發展的和平演進」。一九九一年十一月，政府發表其首份《人權白皮書》，努力化解外國日益增劇的批評及淡化其惡劣的人權紀錄。

一九九二年，商業蓬勃發展。這部份是由於當局宣傳鄧小平南巡經濟特區，並高度讚揚該處的成就。然而，他當眾警告貪污蔓延的危險：如果中國共產黨瓦解，那不會是來自外國侵略或國家動盪，而是來自內部的貪污腐化。一九九二年底，江澤民呼籲採取新指令，支持打擊所有社會毒害的思想，並加強宣傳「愛國主義、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。」

一九九三年，黨通過法案，禁止幹部從事私人企業或充當中間人，在股票市場投機，或給親戚朋友提供合約上的優惠。黨成立了一個審查機制，以監察大眾傳媒內容是否合乎正統，確保剔除任何足「對群眾產生壞影響」的事物。一九九三年夏，政府既把大部份社會毒害歸咎於西方影響，又猛烈抨擊西方人士，指他們繼續散播所謂「黃禍」威脅和危害世界的古老謠言。

一九九四年，黨在新年伊始之際，進一步呼籲堅持正統思想。很多古老的馬克思論調復甦，其中大多針對加強黨的紀律和宣傳。江澤民重申較早前有關對抗社會毒害的警告，而他亦要求黨培育一個具有優良精神的民族，不要空談而要以身作則。（註十八）在三月的全國人民大會上，李鵬警告說，發展、改革與穩定之間的關係，必須獲得正確處理，而迅速和健康的發展必須透過強硬的政治紀律才得以維持；必須加緊控制異見份子；必須採取更佳的保安措施以預防「敵對外國勢力」進一步滲透。政

府在夏季推行一項新運動，其目的是要在群眾，尤其在青年當中灌輸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價值觀。隨後，另一個運動就是強化人民的精神，進一步維持統一，恢復他們的自尊心和自豪感。期間，對抗貪污腐化的戰鬥繼續。儘管官方新聞偶然宣佈勝利，但事實上，這些報導証實過於倉卒，成功的例証只屬少數。在黨內，隨著被控濫用公款的北京市長陳希同黯然下台，掃除貪污腐化的努力達到頂峰。

在一九九五年九月召開的第十四屆五中全會上，江澤民重新推動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。他呼籲立即落實鄧小平的命令，採用一九八六年通過的《決議》為一般方針，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」。他特別提到要關注青年，讓他們「在政府最優越的誠實傳統中」，接受道德及倫理教育，好能「鞏固自己，對抗貪污腐化」。（註十九）當局特別挑選江蘇的張家港，作為經濟及精神成就的範例。（註二十）然而，即使經過上述一連串努力，這場戰鬥距離結束還很遠，事實上這僅僅是個開始而已。

邁向客觀評價

如果說中國過去和現在所進行的道德之戰是一幅灰暗的圖畫，正義的一方似乎輸掉了對抗貪污腐化的戰爭，似乎又有點以偏概全。中國官員經已注意那些容易產生貪污腐化的地方，並已把黨的幹部階級作為主要更新和改革的對象。這亦配合共產黨歷史，其首要優先處理的事項，就是在人民眼中保留黨在道德上的可信性。目前，黨面臨「認受性的危機」。中國共產黨指出，現代化要求穩定，而這種穩定只有在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下才可維持。黨領導層的主要憂慮，是幹部失去思想及道德價值觀。他們看到在群眾當中蔓延的「信心危機」，也深知這對未來並無好處。他們明白到中國執政黨所面對的真正危機，是認受性的危機，而非道德危機。（註二十一）

黨員的道德和政治操守是共產黨生死悠關的問題。不幸地，他們所用來打擊貪污腐化的方法，只

為問題帶來很少的成效。幹部工作隊獲授權教訓和懲罰那些他們指為貪污的幹部同志，反而變成作假証供和個人報復政敵的機制。因此，貪污腐化往往滋生更多貪污腐化。（註二十二）

官方對於道德危機的分析，一般流於簡單和表面，而最終往往只是尋找代罪羔羊了事。當局必然把貪污腐化的成因，歸咎於文革和資產階級——資本主義西化，對經濟改革所造成的實質影響卻僅僅空泛地交代過去。

近期《人民日報》一篇文章指出，很多人仍譴責孝道是一種頹廢的倫理價值，正如昔日文化大革命的法。而那些全神貫注於西方思想的人，視金錢為維持家庭及其他關注的唯一解決方法。（註二十三）另一方面，當局甚少認真分析改革的實際本質是否導致道德危機的主要原因。個人與團體在物質上與心理上所增長的優點和缺點，還有所謂「規範」與「認知」文化之間的分歧、「社會」與「道德」罪惡之間的分別，仍未獲得適當評

價。

正如丁偉於一九九五在《中國評論》所撰寫的一篇文章所指：「最高領導人成功地把中國放在一項具野心的現代化計劃上，因為這切合人民的願望。然而，他沒有給國家帶來一套思想體系。」他批評鄧小平的想法，「沒有清楚指出在達致這些目標時，有什麼事情是應做的或不應做的。」沒有分辨是非，也缺乏鞏固的思想組織。他表明，鄧小平雖然「已把全國從毛澤東遺留下來的思想束縛釋放開來……但這種從『不尚空談』到實際主義的轉變，則是今日中國存在的思想混亂的根源。」（註二十四）

其他一連串可能的原因，包括：由於幹部無知，認為無需為青年提供教育，因而將教育經費挪用到別處；或由於文革的大肆破壞而缺乏教育設施；或因一子政策而製造了新一代被寵壞的「小皇帝」，拒絕傳統自主自律的價值觀。雖然教育家已提出上述的一切（註二十五），但當局只作出很少的回應，甚至還沒有加以實質考慮。

最後，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回應「思想與道德價值觀的迷失」。這情況的出現，並不因為缺乏教育，而是因為人民失去對共產黨的忠信。早在外國思想的影響隨著經濟改革和開放政策而湧入中國，繼而出現那備受攻擊的實用主義以前，共產理想與社會主義價值觀已衰落。由於人民需要新的思想體系，當局便開始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。現時，斷定人的好與壞，並非根據傳統道德準則，而是看他有否堅持黨的路線。那些沒有完全跟政府合作的人，確實為數很多，而當局很快就指責他們要對群眾的嚴重「道德危機」負責。這樣，當局把黨的責任推卸在那些被判斷為社會「不安定份子」和「罪犯」身上。

這種分析中國目前道德危機的方法，深深影響當局如何選取補救方法，也影響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實踐方法。

解決「罪犯」的問題行為的方法，由嚴刑和大量罰款，以至阻撓個人異見或社會抗議運動的預防

措施不一而足。在處理人民的「正確思想迷失」時，當局便鼓勵推行「社會主義教育」和灌輸馬克思主義。其他不同的「教育」方法也有採取，包括制訂新法例、推行龐大道德教育運動以及宣傳角色模範。當局雖然致力訂立新的法例，卻要面臨執行方面的困難。（註二十六）很多幹部不願執行有關法律，有些人則不明白，而其他人甚至不知道有關法例的存在。

道德教育運動的主要對象是青年，最近期的一次運動，強調國家主義和愛國主義，作為適當的思想，既確立黨的中心角色，亦不損害共產黨員的信念。

至於昔日的傳統美德、道德及宗教價值觀，尤其儒家傳統及各大宗教的思想，當局經已加以復甦、收集，並在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方面給予新地位，但很多領導幹部當然對此仍有所保留，因為他們均來自激烈的無神論和唯物主義背景。

當局一直強調宣傳模範人物。政治領袖出席大

場合和盛事，推廣這些人物。當局又利用電視特輯、書籍、人民大會堂的禮儀和儀式，來製造大量模範人物，給群眾尊敬和仿效。政府頗能有效地推動這方面的工作。（註二十七）

當局聲稱，爲了維持穩定的社會秩序，他們在人民身上施加道德準則。而他們是建立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」的唯一演繹者。然而，在履行這工作時，難免出現嚴重的衝突，因爲政府有時要採取行動，對抗那些他們沒有推廣的傳統習俗或道德原則。其中較敏感的價值觀包括：正確運用權力；在政府及工作地方主動推行民主的管理模式；地區自治的程度以及人權與自由這龐大範圍。對於那些被視爲犯法並因此被指爲「罪犯」的人，政府有意嚴厲干預。但是，對於其他道德問題，例如離婚、同居以及同性戀，他們卻很少或甚至沒有理會，因爲他們認爲這些問題對於維持現時的穩定和秩序並無影響。

中國當局推動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努力值

得高度讚揚。然而，他們的主要動機，就是似乎只爲了共產黨的命運。他們既要推動經濟現代化，又須保證思想純正，這樣，有時把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削弱爲穩定過程中的一種工具而已。當局很少關注分析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本身的價值及目標，卻非常關注其政治動機。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，最終可能在與其原意極爲自相矛盾的情況下，以悲劇收場，因爲如果共產黨本身受貪污腐敗所動搖，則如何能使群眾信服，接受他們爲解決道德危機而作出的命令，或如何以不尚空談的態度，施加任何思想價值觀？

（註釋見本刊今期英文版頁18）